

北京图书馆藏石刻叙录（十八）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

五、隋唐石刻

隋唐同秦汉一样，在我国古代史中是一个极为伟大辉煌的时期，在当时世界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后来，世界各国普遍以“汉人”、“唐人”来称呼中国者，就是对这一历史事实的概括。但是，汉、唐又是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们有共同的地方，也有差异的一面，区分两者的异同，对于我们了解唐代特点，探讨隋唐时期石刻的发展规律及其特征，都有重要的作用。

秦汉隋唐都是我国古代时期高度统一的封建大帝国，但秦汉时期的统一，是封建社会初期的统一，隋唐时期的统一，则是封建社会中期的统一，是我国的封建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都达到极盛时期的统一。

从经济的发展看，秦汉时期国家的经济来源主要以黄河流域为基础；隋唐时期，由于长江流域经过了孙吴、东晋、南朝的开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这时期国家经济的主要来源则以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为基础了。这就大大充实和加强了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为隋唐帝国政治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

从民族关系和政治建设的角度看，秦汉时期民族之间的交

流，主要是以华夏族为主体，以黄河流域地区为中心的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隋唐时期，则是在北朝各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基础上，以汉族为主体，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地区为中心的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因此，这时期各民族之间交流与融合的内容，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和提高，互相学习与吸取的东西也就更多，中华民族发展的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政治制度方面，虽然汉唐时期，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在制度的具体内容方面，后者在吸收前者精华的基础上则得到了充实和发展。

从思想和文化的进步看，秦汉隋唐都是我国封建文化大发展的阶段，但具体内容则有了较大的差别。由于隋唐时期的思想和文化，是在秦汉南北朝的基础上发展的，因此，原来有的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原来有而不充分的得到了丰富和补充，原来没有的则有了新的创造和发明。例如，我国几大“教”的情况就是这样。秦汉时期已经出现的儒学，隋唐时期得到了光大发扬；秦汉时期刚传入的佛教和这时在本土酝酿产生的道教，隋唐时期都达到了极盛；原来三教之间各争雄长，到唐时则三教融合，都成为当时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了。与此同时，西方基督教的一支——聂斯托里派，中名“景教”者，也传入中国并得到发展，出现了新的信仰。

从中外文化交流看，秦汉时，虽已打通了“丝绸之路”，中外有了接触，尤其在西域、中亚一带，汉朝已有较大影响；但唐代则达到了新的高度，不仅中国从中西交流中吸取了外国的优秀文化，滋补了自己，而且更以自己的优秀遗产，丰富了世界各国的文明。从而相得益彰都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就，使古代文明达到了新的高峰。

隋唐时期，这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全面发展的形势，也反映到了各个具体的文化形式中。石刻作为当时文明的一部

份，也展示出相应的趋势，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首先，在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受经济条件制约的碑刻、墓志等石刻的镌造有了空前的发展，数量巨大，珍品层出，丰碑巨碣屡见，浩大的刻石工程，不断涌现。

其次，由于思想文化的发展，各种教派和学派都得到发扬，与之相应，各种宗教石刻、儒家石刻的雕造达到了新的水平。儒家刻经，数量空前；宗教刻石之多，为过去历史少见，尤其是佛教石刻，除继承已有的形式，如寺庙碑刻、僧尼塔铭、佛和菩萨造像外，还创造了经幢等新形式。所以，隋唐时期的石刻，真正是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再次，隋唐时期石刻所涉及内容之广泛，分布地区之辽阔，也是空前的，与政治形势完全一致。例如：由于国内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和融合大大加强，各少数民族的石刻也不断涌现，南诏德化碑、唐蕃会盟碑、九姓回鹘可汗碑、阙特勤碑，就是其标志。由于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西方宗教也第一次传到了中国，石刻也有了反响，《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树立，就是其代表。

如此种种，都充分说明，石刻这种文明与其它文明一样，它既要受时代的制约，反映时代的特点，也要在此基础上开拓自己发展的形式和道路。

北京图书馆收藏的石刻资料，从时代方面去统计也以隋唐时期为最多。现按其类别，（过去已介绍过的刻经、墓志、画像、造象等略）选其有特点和代表性者，略加介绍。

1. 碑刻

隋唐时代碑刻，吸收汉碑之长，魏晋南北朝碑之优，从各自的时代出发，又有了发展和创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自己的特点，在碑刻发展史上形成了一个新阶段——唐碑。

唐碑的形制，螭首多蟠龙，与汉碑螭首多蟠螭者异。汉魏碑题额，从额文便可知碑的内容之梗概，有标目之意。但唐以后碑，其额文则异，如有的额题为“大唐”者，睹额亦不知碑意。飞白题额，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

唐碑在书写方面，也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汉魏碑刻书体皆为篆、隶、真书，而以行书写碑，则始于唐太宗《晋祠铭》，后人继之者盛，遂行成为一大宗。

其次，武则天时，自造汉字十九个，风行一时，群臣章奏及天下书契，莫不用之。以石刻而论，至武后载初（公元689年）则无不用新字矣。即是甘肃、新疆、广东、广西、云南等边远地区，亦无例外，可见其声威之大，影响之盛。

再次，唐玄宗自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改“年”为“载”，至唐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又改“载”为“年”，十余年间，寰宇石刻皆书“载”字，无书“年”者。于此，又可见唐时声威之赫，政令之行，虽经“安史之乱”，民心仍未大去。

陵墓碑刻，成群出土者，亦以唐代昭陵碑刻为最显。据《唐会要》记载，昭陵陪葬者有妃七人，王七人，公主十八人，宰相十二人，承郎三品以下五十人，功臣、大将军五十七人，共约一百五十一人，其数伙矣。以近世和新出土碑刻统计，其数仍存三十种左右，是一批十分珍贵的文物和史料。

（一）仲思那等册人造桥碑。

在山东邹县。隋开皇元年二月八日（公元581年3月3日）刻，分两截刻。上截题记，首题“大隋开皇元年岁次丙午二月壬午八日己丑兖州高平县里村仲思那册人造桥之碑”。下截题名。正书，上截十八行，行十八字，下截十八行，行十字。

北京图书馆藏一种。整拓本，一张，高114、宽73厘米。瞿氏旧藏，铃“瞿氏鉴藏金石记”、“兰坡”等印。嘉庆道光拓。此碑，王昶《金石萃编》未载，可补其缺。

（二）龙藏寺碑。

在河北正定县隆兴寺。隋开皇六年十二月五日（公元587年1月19日）刻。撰人据宋欧阳修《集古录》载为张公礼。额楷书题《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十五字。碑阳正书，三十行，行五十字，碑阴及侧有题名五列。向来称隋碑第一，无北魏寒俭之风。此碑书法，不仅字体结构朴拙，用笔枕挚，给人以古拙幽深之感。且从南北朝至唐，在书学之递嬗上亦影响颇大。杨守敬《平碑记》云：“细玩此碑，正平冲和处似永兴（虞世南），婉丽遒媚处似河南（褚遂良），亦无信本（欧阳询）险峭之态”。

北京图书馆藏有十种。其一，整拓本，二张，碑身高163、宽88厘米，额高43、宽29厘米。瞿氏旧藏，为“二缙”尚存之嘉庆道光拓。其二，裱本，一册。张之洞题签，张祖翼补额。有翁方纲、郭尚先、端方、王瓘、杨守敬、王甫、李葆恂、张祖翼、震钧、王懿荣、褚德彝等人题跋，以及陈伯陶、王仁东、继昌、金蓉镜、俞廉三、文悌等人的观款。为第三行“文”字尚存之乾隆嘉庆拓本。其三，整拓本，一轴，有额，梁启超（饮冰室）旧藏，为第三行“文”字尚存之乾隆嘉庆拓本。其四，缪纪珊（铁如意斋）旧藏。其五，陆和九旧藏。

（三）曹植碑。

又称《曹子建庙碑》、《阵思王曹植碑》。在山东东阿县陈思王（曹植）墓旁。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刻。正书兼篆隶，其中有增损假借之字。碑文隶书，二十三行，行四十三字。书法古雅，杨守敬《平碑记》云：“用笔本之齐人，体兼篆隶则沿北魏旧习，然其笔法实精，“真”有篆隶遗法。”

北京图书馆藏四种。其一，整拓本，一张，高167、宽101厘米。为江苏常熟瞿氏旧藏，后归丁福保，并由其子丁惠康捐赠北京图书馆。其二，裱本，一册，陈景恂旧藏。首有嘉庆壬戌（七年，公元1802）钱泳观款，尾有道光辛卯（十一年，公元1831年）六舟

题记及张廷济跋。

（四）扈志碑。

又称《上府臬扈志碑》。原石道光间在陕西西安南乡出土，未几即佚。拓本少见，亦未见著录。《增补校碑隋笔》记为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十一月刻^①。额阳文篆书。文正书，二十六行，行五十七字。

北京图书馆藏二种。其一，整拓本，一轴。刘氏旧藏，钤“刘燕庭审定”印，道光拓。其二，裱本，一册，半开高21.5厘米，宽11.5厘米。额存三字，为“□□开□□公□□碑”。钤“觉盦任杰考藏金石书画”、“任卓群印”、“松窗审定”等印。

（五）赵芬残碑。

原石在陕西西安城南之少陵原，俗呼“太伯冢”，即中兆村。久埋土中，清初出土，碑断残，现存西安博物馆。刻碑时间，其说不一。《攷古录》作开皇五年（公元585年）；《金石萃编》作开皇十年间；近人罗振玉考为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据《文馆词林》为薛道衡撰文。正书。残石存二，一存十三行，行三十字，一存十二行，行二十九字。

北京图书馆藏六种。其一，整拓本，一张高64、宽74厘米。顾广圻、瞿氏旧藏。有顾广圻题跋。钤“顾氏所收石墨”“铁琴铜剑楼”等印。乾隆嘉庆拓。其二，裱本，一册，十三开。陈淮生旧藏，有陈之题跋，钤“淮生”等印。光绪拓。其三，缪纪珊（铁如意斋）旧藏。

（六）贺若谊碑。

在陕西兴平。隋开皇十六年八月廿二日（公元596年6月19日）刻。碑上半清晰，下半漫漶，故下截拓者很少。额阳文篆书题“大隋使持节柱国灵州总管海陵郡贺若使君之碑”。碑文正书，二十八行，行六十七字。此碑书法精整，笔势遒劲，亦隋碑之上品。杨守敬《平碑记》云：“书法方整秀劲，初唐人多用此体。”

王行满《韩仲良碑》即从此出，昭陵诸碑尤多似者”。碑阴有后人补刻之碑，但其内容说法不一，宋人谓为《夫子庙碑》，清毕沅《关中金石记》谓为《大观圣作之碑》。

北京图书馆藏六种。其一，整拓本，一张，有额。碑身高211、宽98厘米，额高42、宽39厘米。顾广圻、瞿氏旧藏，铃“顾氏所收石墨”、“铁琴铜剑楼”等印。乾隆嘉庆拓。其二，整拓本，一张，有额。碑身高89、宽94厘米，额高43、宽41厘米。顾广圻、瞿氏旧藏。嘉庆拓。其三，裱本，一册，附乙丑（民国十四年）五月陵伽山民题跋。

（七）澧水石桥碑。

在河北南和县。刻于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额篆书“大隋洺州南和县澧水石桥碑”。碑文隶书。

北京图书馆藏三种，均整拓本。其一，顾广圻、瞿氏旧藏，铃“顾氏所收石墨”、“铁琴铜剑楼”等印。一张，有额，碑身高132、宽95厘米，额高47、宽46厘米。乾隆嘉庆拓。

（八）李□□（使君）墓碑。

在陕西乾县。开皇十七年二月廿五日（公元597年3月18日）刻，隶书。

北京图书馆藏二种，均整拓本。其一，顾广圻、瞿氏旧藏，有道光癸未（三年，公元1823年）一云散人（即顾广圻）题跋。跋文云：“嘉庆丙子（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赵晋翁处得此本，今年始用《萃编》对读补正，彼脱误甚多，益信石刻非目验亲释不可。道光癸未，一云老人记。”铃“顾氏所收石墨”、“铁琴铜剑楼”等印。一张，高177、宽72厘米。清前期精拓本。

（九）默曹残碑。

又名《经藏壹所残碑》。在山东益都县。刻于国寅朔八日辛酉（即开皇年间）。正书兼篆隶。碑阳存十一行，有二行无字，余各十二字。碑阴存六列，列十五行。一侧正书，存六列一列五

行。

北京图书馆藏二种。其一，整拓本，一张，高57、宽52厘米。顾广圻、瞿氏旧藏，钤“顾氏所收石墨”印。嘉庆道光拓。其二，裱本，章钰旧藏。道光咸丰拓。

(十) 首山栖岩道场舍利塔碑。

此碑石质斑驳，满布小点，俗称《鱼子碑》，或《鱼子舍利塔》。在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济县）。刻于隋仁寿二年（公元602）。贺德仁撰。额阳文篆书，碑文正书，三十五行，行七十字。首题“大隋河东郡首山栖岩道场舍利塔之碑”。

北京图书馆藏四种。其一，整拓本，高210、宽104厘米。瞿氏旧藏，钤“铁琴铜剑楼”等印。嘉庆道光拓。其二，裱本，二册，半开高22、宽11.5厘米。梁启超（饮冰室）旧藏。其三，裱本，有额，额文同首题。

(十一) 陈叔毅修孔子庙碑。

在山东曲阜孔庙。隋大业七年七月二日（公元611年6月15日）刻。陈叔毅撰。额篆书阳文题“修孔子庙之碑”。字径三寸，中界亦阳文，与它碑独异。碑文隶书，二十一行，行四十七字。其文大部完好，仅蚀缺三四字。此碑笔法严整，有汉魏隶法遗意。

北京图书馆存四种。其一，整拓本，一张，高167、宽76厘米。瞿氏旧藏。嘉庆道光时拓。其二，裱本，一册，半开高28、宽14厘米。明拓本。其三，裱本，梁启超（饮冰室）旧藏。

注：

(1) 《增补校碑随笔》，原著清方若，增补王壮弘，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出版。

（徐自强执笔）